

doi:10.16104/j.issn.1673-1883.2021.03.012

防范和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风险的对策研究

常丹

(重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重庆 401331)

摘要: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易地扶贫搬迁为我国扶贫减贫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正处于巩固脱贫攻坚和实现乡村振兴的关键时期,搬迁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直接影响脱贫攻坚成效,防范和化解易地搬迁后续风险具有重大意义。因此,要进一步落实主体责任,把巩固搬迁成果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统筹搬迁群众的后续帮扶措施,着力解决搬迁群众的发展问题;深入推进生态宜居搬迁和农村综合改革,加快形成相互支撑、协调融合的良好互动格局,为高质量打赢易地扶贫搬迁攻坚战奠定坚实基础。

关键词:易地扶贫搬迁;风险防范;可持续发展

中图分类号:D632.4;F323.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21)03-0056-06

Risk Prevention and Mitigation after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CHANG Dan

(College of Marxism,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years of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the polic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At present, China is in a critical period of consolidat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ealiz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fter relocation directly affects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it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event and defuse potential risks of relo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define responsibilities and accountabilities, combine relocation follow-up work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tasks, come up with measures to support relocated people, and focus on solu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problems. It is also important to advance relocation to ecologically livable areas and comprehensive rural reforms, and move faster to build a sound pattern of interaction featuring mutual support, coordination and integration, so as to lay a solid foundation for a complete victory in the battle to relocate people from inhospitable areas.

Keywords: poverty alleviation relocation; risk preventi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一、引言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由政府主导、移民自愿的开发式扶贫项目,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民生工程。“三西”移民是我国探索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的开始,国内相关研究最早以“异地开发”为内容的论文发表于1992年,单振峰提出异地开发有集体移民、劳务输出、异地办场等三种形式^[1]。此后学界很多以“异地扶贫开发”“异地扶贫搬迁”为题进行研究。虽然用词不同,但“易地”的词义大于且包含“异地”,二者研究内容基本一致。以“易地扶贫搬迁”为研究主题的论文最早发表于2002年,2015年后逐渐成为研究热点,并取得丰硕的理论成果。

通过对易地扶贫搬迁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学界在探索和试点阶段大致以政策演进研究为主,包括政策内容和政策可行性研究,马明等针对宁夏实行易地扶贫搬迁试点的必要性、原则、范围、任务、政策措施进行探索,并以加强领导和责任落实来保障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顺利实施^[2]。推广阶段以搬迁安置研究为主,内容涉及安置主体、安置对象和安置模式等三个方面,王永平等总结了贵州在试点过程中探索出依托国有农场、小城镇、旅游区等十种安置模式,并对其进行了客观性评价^[3]。中央统筹阶段则以后续扶持和效果评价研究为主,后续扶持内容包括生产、生活和心理的适应和发展,针对这些问题,涂圣伟提出构建高效动员、融合减贫、

收稿日期:2021-04-06

作者简介:常丹(1990—),女,重庆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资源保障三大体系,并以需求、主体、要素三个层面为政策导向,重点以能力提升来优化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政策^[4]。效果评价涵盖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多个方面,熊升银等依据实地调查数据,提出基础设施、经济状况和公共服务是影响易地扶贫搬迁效果评价的重要因素,并以就业增收、加强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为着力点来提升易地扶贫搬迁的效果评价^[5]。

随着1 000万建档贫困户搬入新社区,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已进入后续发展阶段,把巩固搬迁成果与乡村振兴进行有效衔接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在后续扶持过程中,应以建立产业支撑、完善就业帮扶、提供资金支持和加强社区治理等长效脱贫机制来实现致富增收,同时将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提升搬迁居民的获得感和安全感。

二、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演进历程

(一) 中央引导、地方探索阶段(1982—1993)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一直积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减贫道路。宁夏西海固与甘肃定西、河西合称为“三西”,这里是辉煌灿烂的马家窑文化发源地,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最困难的地区之一。1982年底,针对“三西”地区生态环境恶劣和群众生活困难等情况,国务院决定成立农业建设领导小组来制定和实施“三西”扶贫开发计划。“三西”扶贫开发开创了有计划大规模易地移民搬迁的先河,使我国扶贫工作由救济式转向开发式发展。

(二) 中央鼓励、地方试点阶段(1994—2005)

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给贫困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贫困人口脱贫愿望也因此更加强烈。1994年,移民搬迁首次以中央规划文件的形式正式出现。文件明确了以中西部地区为扶贫攻坚的重点,以开发式移民的方式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困难的地区进行搬迁。1996年《关于尽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决定》又再次将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作为开发式扶贫的首要任务。通过加大扶贫力度和社会各界的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取得显著成效,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东西部之间的差距。2001年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作逐步开展,中央成立专项资金,全力支持易地扶贫搬迁工作。

(三) 中央规划、地方推广阶段(2006—2012)

21世纪初至2012年,易地扶贫搬迁主要以有计划大规模的推进为主,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的示范带动下陆续推广开来。为加强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规划与指导,确保搬迁工作的顺利推进,国家

发展改革委和相关部门不断总结搬迁试点经验,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建议,先后印发了《易地扶贫搬迁“十一五”规划》《易地扶贫搬迁“十二五”规划》,对全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总体部署、安置模式、资金管理、后续发展等提出了明确要求。在国家的鼓励和支持下,重庆、甘肃等地区深入开展实地调研,全面了解和掌握搬迁对象的数量和分布情况,积极探索搬迁安置模式。始终坚持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目的,不断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为提高扶贫开发成效提供了新动力。

(四) 中央统筹、地方实施阶段(2013—2020)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为聚力攻坚、精准施策,确保脱贫攻坚任务如期完成提供了政策支持。为更好地指导搬迁工作,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如期实现,《全国“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规划》明确了搬迁与脱贫“两手抓”,决定用5年时间把1 000万贫困群众搬迁出来,使其彻底摆脱贫困,实现稳定致富。随着易地搬迁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始终坚持以政策为指引,坚决贯彻和落实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促使工作重心由搬迁安置转向后续脱贫。

三、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一) 易地搬迁群众生产生活面临的风险

1. 搬迁群众来源复杂,社区融合难

社区融合程度高低是影响社区和谐稳定的关键因素。首先,易地搬迁导致人际关系网络发生根本性变化。原有互助性的左邻右舍关系会随着搬迁距离而逐渐淡化,新的互助关系未形成则会增加因搬迁带来的陌生感、孤独感。其次,社会交往难度加大。搬迁群众从熟悉的村落搬迁到陌生社区,由于语言表达、风俗习惯、文化水平上存在差别,往往会以小群体自居而不愿过多交往。最后,搬迁群众因生计而外出务工,加上对城镇社区运转方式的不熟悉,很少或不愿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因此社区工作很难顺利开展。人际关系网络、社会交往和社群组织的变化不仅加大了搬迁群众内心的自卑感和隔离感,而且还降低了他们利用社会关系网络抵御生计风险的能力^[6]。

2. 配套基础设施不健全,产业发展难

发展产业是易地搬迁地区实现稳定发展、脱贫致富的最终出路。易地搬迁地区在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上具有相对优势,但也存在很多问题。一方面,受资本、技术、人才等方面的制约,易地搬迁

地区想单纯依靠自身难以实现稳定发展。另一方面,由于搬迁地产业项目单一,欠缺发展产业链和增加产品附加值思维,且在基础设施、市场竞争力和物流成本等方面都处于劣势,后续产业发展将因此受到限制。

3. 内生动力不足, 稳定就业难

大部分搬迁户发展缓慢源于对传统农业有较强的依赖性,习惯于传统的种、养模式。一方面,受自身文化素质的限制。由于搬迁群众长期居住在环境恶劣的地方,生产方式落后、经济基础薄弱、缺乏市场意识;同时部分搬迁群众,特别是“等靠要”思想严重的深度贫困户,他们对政策的依赖性较强、发展观念滞后和脱贫能力不足,想要通过贫困户自身发展生产来实现脱贫致富比较难。另一方面,搬迁劳动力参加培训意愿不强。大部分移民搬迁劳动力常年外出务工就业,不了解或对政策了解较少,不愿返乡参加就业创业培训,而且就近就业或创业的愿望也不强。因此,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仍然是依靠第一产业,思想仍然停留在小富即安、小农经济这个温饱线状态上,致使农业整体效益较低,发展特色产业难。

(二) 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工作面临的挑战

1. 工作重心与搬迁进程不同步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搬迁工作侧重于迁入地的基础设施建设上,而忽视了组织体系和管理服务等“软件”建设。随着群众搬迁入住后,这些问题逐渐显现,具体则表现为后续管理配套虽多,但正常运行较少。一方面,部分安置区党组织、卫生、学校等人员配备和管理经费尚未落实到位,致使相关工作不能顺利开展。另一方面,由于各安置区大小不一且布局分散,部分安置区治安、物业和就业等服务管理机构尚未形成高效的管理机制,导致群众搬迁入住后遇到生产生活问题往往找不到具体负责机构或组织。随着搬迁工作的深入推进,工作重心应由搬迁安置转向后续脱贫,应建立健全相关组织服务机构,让群众对搬迁后的体验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2. 后续帮扶责任落实不到位

易地搬迁是手段,实现发展才是目标。易地扶贫搬迁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由于帮扶责任落实不到位,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也面临不少挑战。第一,扶贫车间带动搬迁群众“家门口”就业增收效果不明显。受资金、技术和管理等方面因素的制约,安置点的扶贫车间大多规模较小,抵御风险和带动扶贫的能力也相对有限,导致

搬迁群众不愿意“家门口”就业,而是选择外出务工,安置区的“新窝”也因此变为“空巢”。第二,搬迁后的心理问题凸显。一方面,在过了大半辈子农耕生活的老人心里,“变”比“穷”更难适应。抓锄头和摸田地是他们的日常,而搬迁后因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使得他们孤独且无所适从。另一方面,搬迁子女的心理健康问题也应受到关注。由于缺乏优质教育资源及家长因生计问题而疏于照顾等原因,部分搬迁子女易出现性格孤僻、学习被动、抗挫及适应新环境能力差等问题,如果不加以重视和引导,将影响其健康心理。易地扶贫搬迁已进入到后续帮扶为主的阶段,搬迁后实现脱贫和搬迁群众的心理健康问题对后续帮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要建立长效帮扶机制,落实就业帮扶和心理帮扶的相关部门和具体责任人,帮助群众尽快融入新社区、开启新生活,确保易地扶贫搬迁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四、防范和化解易地扶贫搬迁后续风险的对策建议

(一) 构建社区共同体, 让移民真正融入新社区

1. 构建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 提升社区自治水平

易地扶贫搬迁将使群众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巨大变化,各种各样的问题也会随着搬迁工作的深入推进而不断发生。良好的社区治理体系可以有效化解矛盾纠纷,增强搬迁群众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因此,必须高度重视社区治理体系建设,各部门要在当地党委政府及易地扶贫搬迁领导小组的正确领导下,根据安置点的具体情况,充分考虑安置人员规模、公共服务资源配置、管理幅度等因素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加快构建以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民需求为导向、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现代化治理格局。首先,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作为贯穿城乡社区治理的主线,全力构建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和德治相结合的城乡社区治理格局,切实提升社区的自治能力、服务能力和安全防控能力。例如,在安置区构建“社区党支部+小组长+楼栋长+网格员”的治理体系,让党组织成为群众的依靠^[7]。特别是当前新冠疫情蔓延下,社区在疫情防控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社区治理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着疫情防控能力的强弱。其次,建立健全基层民主协商制度,将易地搬迁安置区的重大事项纳入协商内容,进一步保障搬迁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最后,加强易地搬迁安置点综合服务体系建设,不断创新服务载体,提高服务实效,

充分保障搬迁群众享受教育、医疗、养老等方面权利。

2. 打造集中安置示范点,提升群众的参与度和幸福感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后续发展中应完善多元主体共同参与资源整合和监管评估,形成合理有效的合作机制^[8];同时鼓励易地扶贫搬迁与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战略、农业产业化及乡村旅游发展、环境综合治理等工作有机结合,深入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建设美丽宜居乡村。首先,引导搬迁户有序向工业园区、乡村旅游区、农业基地进行集中,积极推进集中安置市级示范点建设,对搬迁安置规模较大的安置点,在后续发展、建房等方面给予统筹基建资金支持,切实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其次,街道、居委会要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多措并举调动群众参与创建的积极性,让群众成为文明创建的主力军,真正实现创建为民、惠民、靠民,切实增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创建的获得感。最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继续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集中安置点建设,不断增强安置点发展活力,促进安置区和谐、健康、有序发展,切实提升搬迁居民的参与度和幸福感。

全国将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变为示范点的案例很多,如江西省石城县委充分发挥团属资源的主力军作用,对社区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治理,成功打造了共青团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示范点,使其荣获“十三五”易地扶贫搬迁美丽安置区的称号^[9]。

3. 建设丰富多元的社区文化,共筑幸福和谐家园

易地扶贫搬迁是为了让大家越搬越好,生活越来越幸福。因此,安置区不仅要加强社区硬件建设,而且要重视社区文化建设,让移民尽快融入新社区。首先,传承乡土文化。对各搬迁地及安置区的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和梳理,建立文化遗产资源目录和乡情陈列馆;引导企业家、返乡人才和本地村民积极参与乡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打造具有当地特色的传统文化和乡村文化乐园。其次,丰富文化供给。依据贫困地区的实际,创新推动“互联网+文化”和社区文化服务中心覆盖工程建设,进一步夯实安置区公共文化阵地。如结合时代发展要求,组织实施主题歌舞演出、电影、话剧、书画展等下基层活动,不断开阔群众视野,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最后,促进文旅融合。引导搬迁群众依托地方民族文化和资源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同时对传统文化和技艺加以传承和发扬,开发具有

当地特色的食品和手工制品,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从而实现民族文化助力脱贫攻坚。广西壮族自治区是成功实现文旅融合的典型,该自治区充分利用少数民族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和自然资源等地缘优势,在全盘规划、产业融合和模式创新的推动下,不断加强旅游业与农业、文化和异地安置的融合发展,有效带动了当地非遗文化的传播和产品消费,在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成功实现了搬迁群众脱贫致富,为构筑幸福和谐家园奠定了物质基础^[10]。

(二) 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创新利益联结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带来了广阔的发展前景,而易地扶贫搬迁也使农村释放出巨大的发展潜能。随着资本的涌入,利益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是目前易地搬迁中最迫切、最棘手的问题。因此,要坚持“内生”和“外引”相结合,不断探索产业发展新模式,以实现产业发展助力高质量脱贫^[11]。

1. 加强基础配套设施建设,提升产业投资吸引力

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确保搬迁规划与产业扶贫规划、乡村振兴规划同轨并行,以解决突出制约问题为重点,补齐贫困地区基础设施短板为突破口,始终坚持共建共享原则,不断完善安置点配套设施建设。首先,规划使用专项资金用于解决安置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不断满足产业发展要求和搬迁群众的生活发展需要。其次,加强安置点互联网设施建设。建立和完善宽带接入,同时加强安置区互联网信息内容建设和应用教育,提高群众接触和使用网络的技能,还能有针对性地为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提供信息服务,从根本上解决靠信息致富而资源不足的问题。这不仅能为产业发展提供丰富的物质资源,还能培养一批具备电子产业发展的劳动人才。最后,加强物流基础设施网络建设。结合经济和现代物流发展规律,探索具有低成本、高效率、辐射广的物流发展体系,从而扩大企业的经营和销售范围,为农业和产业的创新发展提供支撑服务。

2. 加大政策倾斜力度,增强后续扶持的能力

目前易地扶贫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巩固搬迁成果阶段,必须围绕后续可持续发展这一目标,进一步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大政策倾斜力度,确保稳定脱贫。首先,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重要战略思想为引领,将易地扶贫搬迁作为脱贫攻坚的一项重点工作,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完善易地扶贫搬迁工作的政策措施。适当加大对深度

贫困地区的帮扶力度,努力实现贫困户无负担搬迁安置、确保稳定脱贫。其次,合理规划搬迁资金,促进资金帮扶与产业协调发展。一部分资金用于搬迁工作的基础性建设,努力实现资金使用进度与搬迁进度一致;另一部分闲置资金用来投资,将投资创造的收益用于后续扶持,不断增强搬迁群众抵御风险的能力。金融发展落后是制约“三区三州”发展的重要因素,完善金融机制与产业融合发展是该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12]。最后,加大监督考核力度。制定成效考核办法,充分发挥考核的引导作用,在国家考核的基础上,将统规统建、生态修复、融资使用和后续帮扶等纳入考核范围。“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在易地扶贫搬迁过程中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仍是后续发展中需要攻克的贫困壁垒,因此要加大扶贫政策向该地区的倾斜力度,因地制宜的优化政策执行机制^[13]。

3.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

创新利益联结机制是搬迁群众获得最大收益的有效途径,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首先,开展“订单式”产业扶贫模式,签订订单收购协议,保底价回收农副产品,解决贫困户发展的后顾之忧。其次,探索企业和贫困户联合合作新模式,实现共赢互利。坚持市场导向和产业引领原则,鼓励贫困群众与公司、大户结成利益联结体,利用各自优势从事产业发展,实现增收致富。最后,立足各安置区资源优势,根据因村施策原则,发展适合当地的特色产业,同时利用互联网和直播带货推广销售,从而扩大创业就业的范围,让搬迁群众积极主动地闯出属于自己的脱贫致富道路。在拓宽贫困户增收渠道的过程中,要尊重搬迁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各方优势,形成政府、农民、企业三方合力,不断延伸产业发展链、提高产品附加值,实现企业发展壮大、群众收益增加、产业提质增效,将传统的“输血式扶贫”变为“造血式扶贫”。谢大伟等人通过对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实地调研过程中,通过对当地六种产业发展模式及制约因素的分析,提出在产业扶贫中要将物质帮扶转变为技术帮扶^[11]。

(三) 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

稳定就业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以加强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建设为重点,不断建立和完善安置家庭就业信息,满足其多元化就业需求。同时,围绕搬迁地具有的相对优势,坚持以产业发展来带动就近、就地就业;通过扶持和鼓

励有条件的移民自主创业、加大区域劳务合作和公益岗位供给等多元渠道促进就业。

1. 强化就业帮扶

就业帮扶是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工作的重点,在后续帮扶过程中要注重扶贫与扶志、扶智相结合,不断激发搬迁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首先,加强安置区就业服务管理。建立以安置家庭为单位的就业服务信息,并根据安置家庭的具体情况开展“因户施策”的就业跟踪服务,满足不同安置家庭的多元就业需求,保障落实搬迁居民的就业和发展问题;其次,优化安置区就业服务供给。全面推进就业服务信息化建设,充分利用网站、滚动屏幕、手机短信、微信小程序等渠道进行岗位信息常态化推送,确保有就业意愿的群众实现“足不出户”获取就业信息,从而大大提高办事效率和服务水平。最后,积极引进第三方服务机制。整合各方资源,建立以政府与企业为主体的对接服务机制,同时充分发挥人力资源公司、劳务经纪人的作用,形成多方合力来协调解决就业创业中的重难点问题,从而更好地解决易地搬迁居民的就业创业问题。

2. 拓展多元化就业渠道

就业问题是我国最大的民生问题,要实现搬迁群众的后续发展必须把鼓励就业创业摆在突出位置,从内生和外生层面构建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不断提升搬迁群众的可持续性生计和发展能力^[15]。首先,鼓励扶贫车间吸纳就业。支持劳动密集型、生态友好型企业在安置区投资兴业、创办就业扶贫车间,有条件的地区还可以根据当地资源加快发展配套产业,搬迁群众实现就近就地工作,这样既能解决就业问题也能兼顾家庭。其次,组织劳务输出促进就业。利用公共就业服务平台、小程序、企业招聘会等渠道为搬迁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求职登记和推荐就业等服务,促进企业和搬迁群众的双向了解和工作对接。最后,扶持自主创业带动就业。鼓励有条件的搬迁群众自主创业,围绕搬迁地具有的相对优势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旅游产业以及商贸物流、民族文化等特色产业,在增收创收的同时也能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从而拓宽就业渠道,实现多元化就业。

3. 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完善职业技能培养体系必须以加快建立并推行城乡一体化,要以适应就业创业、经济社会和个人发展需要为目标,对有培训意愿和劳动能力的搬迁群众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全覆盖,从而有效缓解因搬迁而导致的失地失业问题。首先,创新技能培训

模式,全面提高搬迁群众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当前,职业素养和技能水平已成为影响个人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应以传统的岗前技能培训为基础,针对企业的招聘要求来对搬迁群众实施技能培训,使其符合招聘要求,从而实现充分的就业;同时,积极探索创业创新培训和引导性培训,充分发挥搬迁群众的自主创新能力,不断增强其创业创新发展的内生动力。其次,规范多元培训主体,增强培训实效。坚持以政府补贴培训和企业自主培训为主的培训体系下,大力扶持和规范社会培训机构,立足于市场、企业和个人发展需要,充分发挥不同培训主体的优势,实行多元化教学方式和实践技能培训相结合,使其更快更准的掌握专业技能,从而提高技能培训的精准度。最后,加快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政策体系。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为支撑的权威线上培训公共服务平台,鼓励大家积极参与学习并

提供社会认可的职业技能合格证书。通过建立有弹性、多层次、可选择的培训机制来促进产业升级和劳动力结构调整,充分调动搬迁群众通过技能培训实现就业脱贫的积极性^[14]。

五、结语

易地扶贫搬迁是一项繁重的系统工程,也是我国在脱贫攻坚阶段为解决深度贫困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于有效推动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和生态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具有伟大的战略意义。经过多年的持续攻坚,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取得显著成效。各地要高度重视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发展工作,着力构建产业支撑、就业帮扶、社区治理和基层党建等体系,扎实做好易地扶贫搬迁的“后半篇文章”。

参考文献:

- [1] 单振峰.打好扶贫开发的攻坚战——广西河池石山地区的调查报告[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4):11.
- [2] 马明,仇旭辉,张闽剑.宁夏实施国家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初步设想[J].市场经济研究,2002(2):50-51.
- [3] 王永平,袁家榆,曾凡勤,等.贵州易地扶贫搬迁安置模式的探索与实践[J].生态经济(学术版),2008(1):400-422.
- [4] 涂圣伟.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的政策导向与战略重点[J].改革,2020(9):118-127.
- [5] 熊升银,王学义.易地扶贫搬迁政策实施效果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J].统计与决策.2019,35(13):101-105.
- [6] 吴振磊,李钺霆.易地扶贫搬迁:历史演进、现实逻辑与风险防范[J].学习与探索,2020(2):131-137+2.
- [7] 黄云平,谭永生,吴学榕,等.我国易地扶贫搬迁及其后续扶持问题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0(10):27-33.
- [8] 罗银新,李强,周彬.后搬迁时代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多元参与机制的实践困境及完善——贵州省桐梓县蟠龙社区的个案研究[J].贵州民族研究,2020,41(7):15-20.
- [9] 团石城县委.江西石城打造共青团参与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治理示范点[EB/OL].(2020-11-12)[2021-02-10].中青在线, http://news.cyol.com/app/2020-11/12/content_18849520.htm.
- [10] 吴丽萍.旅游扶贫 绿水青山有“钱”图[N].广西日报,2020-09-18(005).
- [11] 谢大伟,张诺,苏颖,于鸿飞.深度贫困地区易地扶贫搬迁产业发展模式及制约因素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J].干旱区地理,2020,43(5):1401-1408.
- [12] 李波,张春燕,刘丽娜.“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扶贫政策效应与作用机制研究[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48(2):118-131.
- [13] 李俊杰,郭言歌.“三区三州”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执行机制优化探究[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9(5):30-37.
- [14] 武汉大学国发院脱贫攻坚研究课题组.以产业发展保障贫困人口稳定脱贫的战略思考[J].中国人口科学,2019(6):2-14+126.
- [15] 张涛,张琦.易地扶贫搬迁后续就业减贫机制构建与路径优化[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7(4):129-136.